

學術與國家：

國粹、國故與國學的思想論爭

● 羅志田

近代中國士人面臨西潮衝擊，多數中國讀書人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由於政教相連的中國傳統對「學」的強調，這個問題無時不刻與「學」相關；反之，當許多人說「學」的時候，其實考慮的、關注的又決非僅僅是學術，而是遠更廣闊的國家民族存亡和發展一類大問題。

近代中國士人面臨西潮衝擊，在中國已由文變野、實際處於「世界」的邊緣甚至未能「進入」世界的背景之下，多數中國讀書人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由於政教相連的中國傳統對「學」的強調，這個問題無時不刻與「學」相關（這是民初讀書人常能從「物質」上看到「文明」的一個重要潛因）；反之，當許多人說「學」的時候，其實考慮的、關注的又決非僅僅是學術，而是遠更廣闊的國家民族存亡和發展一類大問題。因此，從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爭論開始，到新文化運動時的整理國故、再到北伐前後兩次關於國故和國學的大討論，這一系列論爭都以學術為題，卻遠遠超出了「學術」的範圍，而形成了社會參與相對廣泛的思想論爭^①。

這些論爭有的已為學者所注意而語焉不詳，有的則較少受到學者關

注。如果說清季的材料相對不易搜集，民初幾次爭論的材料其實並不稀見，而且參與這些論爭的人物（特別是新派人物）大多數已經「青史留名」，他們的具體言論似乎仍未受到足夠的重視^②。朱維錚先生約十年前曾指出，新文化運動期間「新潮」與「國故」兩派的論爭，「在學術上並沒有超出」劉師培「當年的主張」^③。這一睿見並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朱先生該文意不在此，也僅僅點到為止。實則幾次論爭的觀念可見明顯的傳承（當然也有變化），尤其是各次論爭的核心關注點基本一致，但既存研究中基本未見將其聯繫起來的思考和討論。

庚子以後，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國粹的願望和具體的努力。民間的「國粹派」近年受到研究者更多關注，直接以「國粹派」或「國粹主義」為題的研究，較早的有楊天石的〈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④；此後中國大陸學

* 本文大致屬於「研究討論」性質，以點到為止的方式提出一些與本論題相關而值得思考的面相，具體的申論請參閱將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拙作《學術與國家：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關於國粹、國故與國學的思想論爭》。

術進入非常時期，倒是美國學者施奈德 (Laurence A. Schneider) 和伯納爾 (Martin Bernal) 分別著有〈國粹與知識份子〉和〈劉師培與國粹〉^⑤；到二十世紀80年代則有胡逢祥的〈論辛亥革命時期的國粹主義史學〉^⑥；進入90年代，相關論著漸多，其中鄭師渠的《晚清國粹派》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關於「國粹派」最為詳盡的研究^⑦。此外，廣義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近代學術史、思想史和具體的南社、同盟會、辛亥革命以及相關人物 (特別是章太炎) 的既存研究多少都與「國粹派」相關，均不容忽視，此不贅。

不過，由於國粹學派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如學派之內各人觀念的異同、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以及國粹與歐化之爭等一系列問題仍有許多可以探討之處。尤其清政府方面保存國粹的相關努力很少有人關注，將朝野的類似關懷結合起來探討者更幾乎未見。實則清季朝野雙方不僅有對立的一面，也有共同的一面；在保存國粹方面，有時像章太炎和張之洞這樣在政治觀念上對立的人，其文化共識的程度或者還超過太炎與吳稚暉這樣政治觀念相近之革命黨人。

從辛亥革命到張勳復辟，國人似更多關注直接的政治問題。胡適在二十世紀20年代初注意到，因古學界青黃不接所造成的學術寂寞使許多人產生古學將要淪亡的悲觀，結果「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⑧。然而造成那時與「古學」相關的學術寂寞恐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學術」、特別是國人真正熟悉的傳統中國學術在此期間基本淡出思想言說的中心。在民初趨新的大勢下，一些舊派人物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努力的確只能是「沒氣力的反動」。

真正使國學／國粹回到思想言說中心的是五四後新派人物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這一當時影響巨大的努力雖然在各種思想史和學術史論著中不時被提到，但不知為何迄今少見專門而系統的研究。陳以愛最近關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新著，雖然僅選取一個機構在一段時期 (1922-27) 裏的發展進行探討，或可說是這方面第一部比較詳細的專著^⑨。此前較有分量的論文多側重於提倡整理國故最力的胡適，然數量也不多^⑩。新近一些學術史研究對此有較前更具體的關注 (即不僅是提及而已)，尤其桑兵教授對「國學」的整體性研究論著仍在刊布之中^⑪，但關於「整理國故」的專門研究仍待來者^⑫。而1919-29年間幾次關於國故或國學的思想論爭，既存研究或偶爾提到，或幾乎未見提及，顯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從清季起這一系列思想論爭最顯著的主線是 (廣義的) 學術與國家的關係，在近三十年間大體經歷了從保存國粹到整理國故再到不承認國學是「學」這一發展演化進程。從稱謂看，又大致經歷了從「中學」到「國學」／「國粹」再到「國故 (學)」／「國學」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說，「國粹」、「國學」、「國故」等詞彙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章太炎在1906年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時，他 (以及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等) 有意無意間不過是換一個標籤而試圖將在時人思想言說中已經邊緣化的「中學」拉回到中心來；但正由於國粹與中學的接近，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說基本是不成功的。

就清季而言，從「中學」而「國學」

從清季起一系列思想論爭最顯著的主線是學術與國家的關係，在近三十年間大體經歷了從保存國粹到整理國故再到不承認國學是「學」這一發展演化進程。「國粹」、「國學」、「國故」等詞彙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

而「國粹」這一進程當然未必即呈線性發展，具體到個人則可能還先言「國粹」而後說「國學」^③。但許守微1905年發表在《國粹學報》的〈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一文提示着「學」這一稱謂至少在中西對立方面已明顯改變（詳後），章太炎恰在次年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顯非無因而至。到1908年，太炎自己在其〈規新世紀〉一文中已將「國粹」、「國學」和「國故」三詞並用，那時基本是作為互換的同義詞而避免文字的重複；但一年多後他將其重要著作命名為《國故論衡》，則意味着在意識層面對「國粹」的正式棄用，且多少隱含着「反戈一擊」之意：「國故」當然比「國粹」更中性，而「論衡」則義本王充，明顯有商榷批評之意。不過，「國故」一詞的真正流行還在十年之後了。

對一般人而言，「國粹」、「國學」、「國故」這幾個名詞在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間大致為許多人互換使用。如果姑以「國學」統稱之，則甚麼是國學？國學是否妨礙中國「走向世界」？以及國學（或其後來的變體「文化史」）自身怎樣走向世界？這些都是當年學人與學術社會非常關注並一直在思考和爭辯的大問題。就表述方式言，或可以說許守微1905年凸顯的「國粹與歐化之爭」是從「中西學戰」到「中西文化競爭」之間的過渡階段，三者基本同義。清季朝野各方在努力保存國粹的同時已對「歐化」採取既抵拒又包容的態度，民初學人大致繼承了這一取向。由此視角考察從保存國粹到整理國故再到不承認國學是「學」這一蘊涵複雜而發展曲折的演化進程，當更容易看出各派觀念的異同所在。

總體地看，庚子後士人關懷的主要問題及許多具體論題、論點皆與甲午至戊戌維新時相類，有明顯的繼承

性；但不同之處也清晰可見，主要因士人思想資源的擴充、日本的影響增強、戊戌後康梁的逃亡辦報、雜誌的大量湧現和留日學生開始較多發言等，而用以表述思想的術語尤可見明顯的突破。當時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在共同的關懷之下卻常常缺乏共識，比如當時一般人眼中的新舊雙方（以及新舊陣營內不同的派別）大家都意在致用，而何為「有用」，所見卻大不相同，這是時人言論分歧的一大關鍵。

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的思想關聯部分即體現在甲午中日戰爭後開始的關於中學（舊學）是否有用、有甚麼用、及甚麼才有用等系列問題對庚子義和團之役後士人的影響，並因此產生關於物質文明與文質文明的區分和對後者的特別注重，復因中學（主要在物質層面）的「無用」發展到中國「無學」的認知，而中西學戰的存在又不允許中國「無學」，結果導致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君學」與「國學」的區分和對「古學」的全面疏理（部分也因欲模仿西歐實行中國的「古學復興」），最後由於古學難以包容西學而使更具開放性的「國學」或「國粹」這樣的新術語得以流行。這一進程未必呈線性發展，但大體維持着一種邏輯的聯繫。

庚子後士人多以為政府不足以救亡，因而不可恃，故朝野雙方在政治上相當對立。但在文化方面，畢竟國粹學派的組織是國學保存會，其標誌與同樣明確以「保存國粹」為口號的「存古」取向非常相近；且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傾向於中西調和的取向，對稍後所謂「歐化」取容納態度，而非完全排斥；故當時朝野之間的衝突和緊張程度不像以前認知的那樣嚴重，可見明顯的共性。在朝廷的一面，張之洞所

1908年，章太炎在〈規新世紀〉一文中已將「國粹」、「國學」和「國故」三詞並用，但一年多後他將其重要著作命名為《國故論衡》，則意味着在意識層面對「國粹」的正式棄用，且多少隱含着「反戈一擊」之意：「國故」當然比「國粹」更中性。不過，「國故」一詞的真正流行還在十年之後。

謂欲強中國不得不講西學、欲存「中土」之認同又不能不講中學那種曲折心態相當有代表性；在民間則有提倡開放的國學、強調國粹不阻歐化的國粹學派。兩者的共性是大致遵循溫故知新或「新故相資」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

不過，官方與民間關於保存國粹的具體取向則頗不相同，且時常視對方為對立面，這一實際存在的衝突和對立無論如何不能輕視，故國粹學派與辦理存古學堂的官方在保存國粹方面的實際努力及其觀念異同值得認真考察。而且，當時仍有不少人更多看見國粹與歐化那衝突的一面。同樣以歐洲為學習榜樣的吳稚暉等提倡無政府主義者，當時就認為中國「古學」缺乏可開發的思想資源，明確表示不贊同「古學復興」，而主張直接走「歐化」之路。對特別強調「國家」存在意義的國粹學派來說，若棄國粹而歐化，結果可能是雖富強而文明卻已非「中國」，故在清季最後幾年本來對歐化持開放態度的國粹學派、特別是章太炎等人針對棄國粹而歐化的主張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其核心則在語言文字之上：始則貶斥「東瀛文體」，繼而反對採用「萬國新語」，這與清季語言文字地位的上升有直接關係。

隨着近代尊西趨新大勢的強化，起源於傳教士的中國文字難這一觀念在許多中國士人中日益普及，且被認為是造成中國人識字率不高故影響「開智」的主要原因，因而出現了簡化中國文字甚至再造中國新文字的主張，後者多與拼音化相關，更甚者則提出廢棄中國語文而採用萬國新語，在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尤力。與此同時，由於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在清季最後幾年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語

言文字地位逐漸上升，被視為「國粹」的要素之一；故國粹學派所提倡的「古學復興」，其一個重點即落實在語言文字之上。

語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還是構成民族或「國粹」的要素？它是否應為中國在近代中外國家競爭中的表現不佳承擔責任？它能否影響晚清朝野試圖改善中國在世界的地位這一共同的目標？如果能夠，怎樣影響？中國應該拋棄傳統、減輕包袱、走直接「歐化」之路還是尋求一條國粹包容歐化的「古學復興」之路？這些問題在清季最後幾年受到朝野共同關注，並引起激烈的觀念競爭。如果一個物質上像歐美或日本那樣「富強」、文化上像它們那樣「文明」、但其認同上已沒有多少「中華」成份的「國家」出現在東亞大陸之上，這個「國家」還是「中國」嗎？用今日的話說，當實現中國「國家」這一實體富強（甚至「文明」）的目標與落實在中華民族之上的中國這一「民族國家」的存在發生衝突時，應該做出何種選擇？

對於這些問題，當時的國粹學派和歐化派（皆取其大意）有着相當不同甚至對立的答案。而革命黨人內部的對立有時甚至超過其與清政府的衝突，後者那時也在充滿內部阻力的情形下嘗試推行拼音化的「簡字」。章太炎等也曾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的人卻不能容忍用「萬國新語」取代中文，結果形成一場革命黨人內部的爭論。此前，與語言文字密切相關的文體問題已成為朝野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在「東瀛文體」及構成此文體的重要特徵「新名詞」越來越流行於中國的同時，貶斥和抵制「東瀛文體」也日漸形成朝野一致的風氣（這並不意味着這樣的「一致」是朝野共謀的，也未必是有意

吳稚暉認為中國「古學」缺乏可開發的思想資源，明確表示不贊同「古學復興」，而主張直接走「歐化」之路。對特別強調「國家」存在意義的國粹學派來說，若棄國粹而歐化，結果可能是雖富強而文明卻已非「中國」，故在清季最後幾年，針對棄國粹而歐化的主張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其核心則在語言文字之上。

五四後興起的「整理國故」的努力，引發一場以北大學生為主要的思想論爭。就其既與學術相關然其關懷又超越於學術的特徵而言，這次論爭上承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爭議，下啟與「科學與人生觀之爭」同時及北伐之後兩次關於國故和國學的討論。

識的)。關於文體和新名詞的爭議不僅反映了清季士人對一些基本思想和學術問題的見解，揭示出時人對日本這一敵國既試圖效法又欲有所區別的心態，尤可見當時新舊的糾纏互滲已到較難區分的程度。

「國粹」一詞被其主要的倡導者棄用，部分也因為他們本不認為中國傳統一切皆「粹」，而提倡將傳統區分對待，故曾重建出別於「君學」的「國學」。而且，國粹學派正是在試圖區別於日本「國粹主義」之時隱約覺察到「國粹」這一新名詞有些問題，並開始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當的方式來表述「國粹」。章太炎便重新詮釋了「國故」一詞而使之流行。傅斯年指出，「國故一詞，本為習用，即國朝之掌故也。乃太炎盡改其舊義」。然因「清末民初，人以國學二字為不妥，遂用國故」^④。

五四後興起的「整理國故」的努力，以其影響範圍的廣闊和參與者的眾多，大致可以算作一場「運動」。而整理國故的主張甫提出便引起了爭議，引發一場以北大學生為主要的思想論爭。與清季相同，論爭雙方的共同之處不少，尤其是繼承了晚清學戰的傳統，特別注重「學」或後來開始流行的「文化」層面。就其既與學術相關然其關懷又超越於學術的特徵而言，這次論爭是從清季開始的系列論爭的一部分，它上承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爭議，下啟與「科學與人生觀之爭」同時及北伐之後兩次關於國故和國學的討論。

與清季關於國粹的論爭相近的是，1919年這次論爭已不是純粹中西之間的學戰，「一切以古義為斷」的「大國故主義」已基本退隱，參與思想競爭的已是大致繼承了清季保存國粹論者

的中西調和取向而主張「國故和科學並存」的另一種「大國故主義」了。此後即使這樣的舊派也逐漸淡出，到1923年初胡適和梁啟超為清華學生開具「國學書目」，又引發一輪關於整理國故的新爭論；這次再爭論已不在新舊兩派中進行，參與者基本皆新派人物，毋寧是一場新派內部試圖整合觀念的努力。那時不論支持還是反對整理國故之人都經常援引「科學」以為助，像吳稚暉、康有為這樣政治、文化立場都相當不同的老輩此時均特別強調中國急需的是「科學」的物質層面，而林玉堂(林語堂)等幾位對「國學」認知不甚相同的年輕留學生卻更注重「科學」的整體性(其實是更側重其「精神與方法」)，並進而提出了「科學的國學」的口號。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吳稚暉那時要反對的已是用西方觀念武裝的「洋八股」，可知咸同時一些士人主張的中學勝於西學這樣一種「純八股」觀念已不能在民初的思想言說中立足而參與思想競爭，主張完全回向傳統的取向即使存在，也如毛子水在1919年所說，因「錯處容易明白」而沒有多少反對或打擊的必要^⑤。由於「中學」先後以「國粹」或「國故」的表現形式重新進入中國思想言說的中心，一些新文化人發現此時「八股」又因「洋」的包裝和支持隱而復顯，兩者的結合對中國的發展構成了新的甚至可能是更嚴重的「威脅」。吳稚暉便認為「洋八股自是一種當行出色的新國粹」，他最擔心「若真把線裝書同外國文學配合成了洋八股，當此洋功名盛到頂點時代，那就葬送了中國，可以萬劫不復」^⑥。在西學掌握「話語權勢」的時代，「國粹」若有西學為之正名，將難以破除打倒，這才是吳所懼怕的。

這也是導致一些新派學者轉變態度的重要因素，他們在最初論證整理國故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時，基本不存「打倒舊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後幾年間卻轉而將整理國故與破壞性的「打鬼」聯繫起來。最具象徵意義的是與整理國故有一定距離的文學研究會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說月報》上分別刊發兩組相關文章，前者力圖為整理國故正名，後者卻激烈反對國學。其實在整理國故運動內部本存在一種從病理學的意義來看待整理國故的思路，以為通過整理可防治中國固有的疾病。沿此理路走向「打鬼」甚而主張基本放棄整理國故也是比較自然的發展，但新派學者這一態度的逆轉主要還是與當時的世風密切關聯，許多人正是基於整體性的新舊不兩立的認知，為劃清與「舊派」的界線而走上反對自己前期主張之路。

從十九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到1945年抗戰結束，對於久處外患壓迫下的中國士人來說，二十世紀20年代可能是中外「國家」實體競爭最為淡化的時段。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別是「學術」與「國家」的疏離：對強調「國無學則不立」的清季士人來說，國學既不能「無用」，也不能不是「國粹」；但對提倡「科學無國界」的新文化人來說，「學術」與「國家」可以無關，至少關係不密切^⑩。正是在這樣一種立場之上，「國學」本身成為可以比以前遠更輕鬆地進行討論的題目。隨着一度風靡的整理國故開始走向衰歇，「國學」本身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也產生了問題。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代「國學」，有人根本主張「國學」不是「學」。

然而，胡適等人轉變其對整理國故的態度本身又是認為「國學」妨礙了

「中國」這一國家實體的發展，即鄭振鐸擔心的會「有阻礙於中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阻礙「中國國力及文化的發展」^⑩，無意中仍回到「國家」立場之上。結果，在較少受到外患直接壓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離的「學術」與「國家」再次凸顯出其緊密的關聯，體現了民初思想對清季思想的繼承。或者說，在意識層面力圖區分「學術」與「國家」的民初趨新學者在下意識層面仍相當注重「學術」與「國家」的關聯。

其實，趨新學人在意識層面與下意識層面之間的此種心態緊張本肇端於清季，當時國粹學派一些核心人物一方面自己推動學術「物質化」的趨勢，卻又（多半無意識地）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他們的思想資源日益西化，卻又不能完全認同西方思想；在其界定的「國學」或「國粹」向西學開放的同時，卻又不能迴避中西「學戰」的實際存在；西來的民族主義學理喚醒了許多人內心中潛伏的夷夏之辨觀念，並因此而導致反滿革命意識，但當面臨「中外」這一更基本的衝突時，區分滿漢的觀念又退居二線了。這其間「學術」與「國家」的關係既有互補的一面（如學亡則國亡、保國與保學），也有緊張的一面（如究竟以「國家」的象徵黃帝紀年還是以「學術」的象徵孔子紀年）。而士人基本價值觀念和國家認同（即是否承認「大清」為「中國」）的暗中轉換，恐怕有相當的代表性。

時人內心之中新舊思想資源混雜、競爭和互動這樣一種至為複雜的多層面緊張與外在的中西新舊之間那複雜曲折的相互關係有直接的關聯，而個體士人內心的緊張狀態大致也表現在群體心態之中（程度容有不同，甚

二十世紀20年代可能是中外「國家」實體競爭最為淡化的時段。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別是「學術」與「國家」的疏離：對強調「國無學則不立」的清季士人來說，國學既不能「無用」，也不能不是「國粹」；但對提倡「科學無國界」的新文化人來說，「學術」與「國家」可以無關，至少關係不密切。

至可能很不同)，且延續到民國初年。1920年即有人提出，「新舊」之分有時間意義和空間意義兩方面，前者以「現在」為基準，「過去」為舊而「未來」為新；後者則以本地所未前之有之外來者為新。由此角度看，「吾國今日新舊之爭，實猶是歐化派與國粹派之爭」，基本屬於空間意義的新舊^⑩。這一「空間意義的新舊」不過是「中西」的代名詞，且在多數時人認知中與時間意義的新舊仍頗有關聯。

面臨這一局勢，新文化人創造出一種在古今與中西之間換位的方式來化解緊張。他們引入一個新的空間範疇「世界」而賦予傳統與現代的時間區分以新的含義：世界常常代表「新」的未來，而中國則更多象徵著「舊」的過去；空間上的「世界」雖約等於「歐美」而未必包括「中國」，但只要時間上「現在」的中國割斷與「已死的」歷史的聯繫而認同於「正在生長」的「世界」，便可以成為想像中的「未來世界」之一部分。在這新「世界」裏，不再有空間的中西之分，大家都「正在生長」因而是可能平等或正走向平等的成員（其實中國人自己內心仍不認為中西平等，故中國還要全面向西方學習）。

這樣一種充滿想像意味的特殊時空互動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新文化人一種相對超越的地位，或者說他們常常通過時空換位給自己營造一個超越古今、中外二元對立的超越地位：時間上的「現在」使它們輕易超越空間上的中西對立，而空間上的「世界」又使他們隨時可跳出（中國）「古代」的籠罩。這樣，近年說得熱鬧的人我之別（Other &/vs Self）理論對新文化人的詮釋能力便相對有限，因為他們可以而且實際上也確實通過時空移位而不時轉換身份認同。雖然這樣的時空換位

基本是在「精神」而非「物質」領域裏進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往往無意接納甚至不那麼平等對待以「世界民」自居的中國人），但仍給新文化人以超乎尋常的自我批判能力，使他們可以激烈反傳統且公然認同於西方而沒有多少內心不安，因為他們正在為中國再造文明，面向的是一個光明的未來。

這就牽涉到晚清以來士人的一個主要關懷（雖然是有重大分歧的關懷）：要改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是「溫故知新」、走「古學復興」之路還是「面向未來、推陳出新」，再造一個新的中國文明？兩種路向雖異，其關懷卻同。毛子水曾說「國故」派的張煊不過要為「『國』和『故』爭一個地位」，實有所見。所謂「國」的地位，大致也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究竟處於一個甚麼地位及時人對此的希望（即中國應該處於甚麼樣的地位）；而「故」的地位則多半意味着傳統（時人更多用「古代」一詞）在「現代」裏應否佔一個地位及佔一個甚麼樣的地位；兩者在當時又是緊密關聯和相輔相成的。

由於中國在近代中外「物質」層面的競爭已明顯敗落，且新文化運動時新舊士人關注的重心本來也多在「文明」或「文化」層面，如果中國的「故」沒有甚麼地位，則中國在「世界」上實際等於無足輕重。這正是為甚麼不少五四人說到「科學」便強調其「精神」和「方法」並具體化為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的一個重要潛因，而「科學」的兩大分支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在實踐層面又落實在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為代表的「社會史研究」之上。這既有中國學人對考據方法相對熟悉而能有所為這一技術層面的因素，也因國人隱顯不

毛子水曾說「國故」派的張煊不過要為「『國』和『故』爭一個地位」，實有所見。所謂「國」的地位，大致是中國在世界上究竟處於一個甚麼地位及時人對此的希望；而「故」的地位則多半意味着傳統在「現代」裏應否佔一個地位及佔一個甚麼樣的地位；兩者在當時又是緊密關聯和相輔相成的。

一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起作用。沒有科學的支撐，國學便上不了台面；沒有「國故」這一多數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具體治學對象，以方法為依歸的「科學」便不能落在實處^②。

胡適當時就指出，整理國故是「我們『最易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他特別強調，「東大與北大，雖同為國立的，而在世界學術上，尚無何等地位。要想能夠有一種學術能與世界上學術上比較一下，惟有國學」^③。實際上，那時比較有成就的也只有國學，顧頡剛就注意到「別的科學不發達而惟有國學發達」的現象^④。不過，由於胡適自己帶頭轉變態度，以及當時許多學人根本不承認國學是「學」，尤其思想上相當對立且學術取向也頗多歧異的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的學人在「國故學即是文化史」一點上達成了大致的共識，在這樣的思想與學術互動中，「國學」一名終於不立，最後還是中國所固有而西方學術分類中也存在的史學被確立下來，「國學」遂在反對聲中淡出思想和學術的主流。

註釋

① 「相對廣泛」這一定語應予充分注意，這一系列論爭以至我們史學研究中備受重視的清季民初新舊之爭，其實都是充滿士人關懷、主要在精英之間展開的爭論，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當時全社會的關注，還有待考證。

② 據說中山大學歷史系正有人以黃節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關於民初的爭論，一個少見的例外是沈松僑的《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該書以四頁約兩千字的篇幅論述了1919年以北大學生為主的關於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

③ 朱維錚：〈失落了的文藝復興〉，收入其《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132。

④ 文載《新建設》，1965年2期。

⑤ Laurence A. Schneider,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Intelligentsia" and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ed. Charlotte Fur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57-89, 90-112.

⑥ 文載《歷史研究》，1985年5期。

⑦ 如吳雁南等主編：《清末社會思潮》的第七章〈國粹主義的「復興古學」〉（張恒平執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360-423；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按鄭師渠另著有《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書未見）；朱維錚：〈失落了的文藝復興〉，收入其《音調未定的傳統》，頁132-40；丁偉志：〈晚清國粹主義述論〉，《近代史研究》，1995年2期；王汎森：〈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大陸雜誌》，90卷6期（1995年6月）；王東傑近年有三篇相關論文，即〈國學保存會和清季國粹運動〉，《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1期、〈歐風美雨中的國學保存會〉，《檔案與史學》，1999年5期、及〈《國粹學報》與古學復興〉，《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5期。木山英雄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學人》，第10輯，1996年9月）從文學角度討論問題，亦可參考。與此論題密切相關而值得參考的還有俞旦初的《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2000年6月）。

⑧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頁1-2。

⑨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系，1999)。此書雖尚存可議之處(如立論時像多數中國近代史論著那樣有偏向「新派」的傾向)，但四百餘頁的論述大致建立在堅實而廣泛的史料基礎之上，值得認真閱讀。尤其這不過是作者的碩士論文，可以讓我們正在指導研究生論文的博碩士生導師們反思之處真的很多。

⑩ 李孝悌：〈胡適與整理國故——兼論胡適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食貨月刊(復刊)》(台北)，15卷5-6期(1985年11月)；耿雲志：〈胡適整理國故平議〉，《歷史研究》，1992年2期；雷頤：〈胡適與「整理國故」運動〉，收入其《時空遊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84-202。

⑪ 比如王汎森的〈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和劉龍心的〈學科體制與近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兩者均收入羅志田主編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31-130、449-580。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歷史研究》，1996年5期；《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桑教授還有一本相關著作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是鍾少華的〈試論近代中國之「國學」研究〉(《學術研究》，1999年8期)，此文稍奇特，引書甚多而不分層次(如作者最欣賞的是一本影響不甚大的中學教材，儘管中學教材也有影響較大者，如錢穆的《國學概論》)，且好發議論而不無偏見(如作者自己也介入討論，認為「硬把國家同學術綁到一起，以希望作為抵抗外來傳入的新人類知識的武器，這種徒勞的努力，歷史已經將之廢棄了」；同樣，國學分類的混亂也是因為「將『國』與『學』攪拌到一起」的問題沒解決好，引文在頁31-32)；然若暫不論其「評價」，這裏正體現出該文實有所見，

即注意到學術與國家關係的重要性。

⑫ 據我所知，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徐雁平君正就此為題進行其博士論文的研究。

⑬ 參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頁112-13。

⑭ 傅斯年致朱家驊(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承杜正勝所長惠允使用。

⑮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頁732-33。

⑯ 〈吳稚暉先生來信〉，《晨報副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1923年10月15日，2版。

⑰ 學術超越的觀念在新文化運動前期甚得提倡，但顯然受到五四學生運動的有力衝擊；或正因此，在20年代初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中，學術超越的觀念反得到較前更有力的提倡，這一趨勢要到「九一八」之後才有較大的改變，詳另文。

⑱ 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20卷1號(1929年1月)，頁12。

⑲ 管豹：〈新舊之衝突與調和〉，《東方雜誌》，17卷1號(1920年1月10日)，頁89-90。

⑳ 參見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㉑ 〈教務長胡適之先生的演說〉，《北大日刊》，1922年12月23日，第8冊，頁2；胡適：〈再談整理國故〉，1924年1月，收入許嘯天輯：《國故學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影印群學社，1927)，第1集，頁22；均引自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頁96-97。

㉒ 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2:13(1926年1月6日)，頁10。本文承劉龍心小姐賜贈複印件，謹此致謝。